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时论的 警惕与战略对峙

—— 1959年庐山会议重大背景的发掘研究

马社香

(江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56)

〔摘要〕 本文旨在客观回归1959年庐山会议,深度探索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如何面对当年6月20日苏共中央中断提供原子弹样品及技术资料的信件,回击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指责。在时未公开的这种警惕对峙中,硝烟如何扩大到与赫鲁晓夫公务接触的彭德怀身上,由此构成了1959年庐山会议错综复杂的历史节点,成为错误批判彭德怀等人扑朔迷离的一个客观成因。

〔关键词〕 毛泽东; 赫鲁晓夫; 彭德怀; 庐山会议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999(2016)02-0026-06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探讨1959年庐山会议文论较多,主要围绕着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意见书”,及纠“左”反右,背景成因,比较详尽地探讨了错误发动对彭德怀批判之然。研究1959年庐山会议,不能仅仅局限于研究毛泽东与彭德怀个人的分和,而忽略其历史衍变的其它节点。本文试图由此切入,梳理与探讨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在庐山会议前夕收到苏共中央中断提供核武器样品的信件,对赫鲁晓夫相关时论及行径的高度警惕,令人十分遗憾地导致了彭德怀的错误批判。

(一)

1959年1月27日,苏共“二十一大”召开,释放了两大重要信息:一是提出排除世界战

争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二是“大会意识形态论述中对公社问题的阐述表明,莫斯科间接地对北平进行了指责”,此即受到美国国务院情报局的高度关注。^{〔1〕}3月5日,美国续与日本、韩国、东南亚八国等签订共同防御协定^{〔2〕}后,再与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分别签订双边军事协定^{〔3〕},进一步加剧了对新中国地缘的战略合围。3月10日,我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在外部势力唆使帮助下,不久逃至印度。4月23日,赫鲁晓夫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主张在空间停止一切核试验。

5月15日,赫鲁晓夫再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信,信中写道“您对我今年4月23日的信的复信收到了。苏联政府对美国政府的声明表示满意。……苏联政府一向希望永远地和普遍地禁止试验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这是符合各国人

〔收稿日期〕 2016-01-05

〔作者简介〕 马社香(1955-),女,湖北武汉人,江汉大学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及生平研究。

民的利益的。苏联政府确信，根据上述考虑，将能够找到解决办法，来排除我们之间的分歧，并在最近期间达成协议。”⁽⁴⁾ 同一天，赫鲁晓夫以同样的内容向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复信。⁽⁵⁾

赫鲁晓夫这番对美、英的表态并非空穴来风。是时新中国核武器正在研制关口，按照1957年10月15日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1959年6月，苏联应如期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相关技术资料。6月8日“苏、美、英三国关于停止核试验会议在日内瓦开始举行”⁽⁶⁾。6月20日，苏共中央通过了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为不影响苏、美、英首脑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日内瓦会议的谈判，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待两年后，“彻底澄清西方国家对于禁止试验核武器问题以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态度”时，再决定提供与否。苏联认为，这样做不会影响中国的研制，因为“中国生产出裂变物质至少还要两年，到时才需要核武器的技术资料”。⁽⁷⁾ 苏共中央这封信不仅堂而皇之单方面“腰斩”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同时极为强势地释放了赫鲁晓夫靠拢美英，遏制或打压新中国研制核武器之势。对于这一点，美国国务院情报和研究署早在1959年3月27日的报告中就判断了苏联不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资料。因为“北平获得核武器将使莫斯科孜孜以求的苏联在裁军领域的目标进一步复杂化。此外，莫斯科将从根本上对北平拥有核武器是否是明智之举产生严重怀疑”⁽⁸⁾。

1959年6月26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苏达可夫向周恩来递交了苏共中央这封信⁽⁹⁾。《周恩来年谱》同日记载了周恩来接见苏联专家，就“大跃进”发表讲话“中国搞大跃进的目的是为了迫切需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担负起我们在社会主义阵营应当担负的任务。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是发展的速度，第二是平衡，第三是质量。我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¹⁰⁾ 周恩来这个讲话与毛泽东的相关思考完全一致。6月27日，周恩来到医院看望陈毅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后离开北京。⁽¹¹⁾ 此时周恩来当确知苏共中央6月20日来信内容。

《周恩来年谱》记载：1959年6月28日，

周恩来到达武昌，毛泽东从长沙来电话，商量庐山会议召开的具体的问题，周恩来作了补充。⁽¹²⁾ 这个补充，应该包括刚刚了解的苏共中央来信内容的汇报。所以，7月1日毛泽东上庐山后，对原计划讨论的问题两次作增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十八、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十九、国际问题。”⁽¹³⁾ “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¹⁴⁾ 毛泽东将对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认识，特别放在国际问题讨论中，这表示了毛泽东早已知道苏联对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有些看法及6月20日苏共中央来信，字里行间流露着某些警惕。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不讲原则”或“信用”的警惕由来已久。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向我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提出希望中苏两国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电台。⁽¹⁵⁾ 1958年7月，发生了苏联大使尤金转告赫鲁晓夫希望中苏建立联合舰队之事，毛泽东7月22日与尤金谈话，一针见血质疑“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在这个（联合舰队）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¹⁶⁾ 一叶知秋，毛泽东已看出苏联企图将中国国防逐渐纳入苏联指挥棒下的某些迹象，故毫不含糊地表达了既要维护中苏友谊，又要高度警惕苏联以合作之名的各种控制。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以将与美、英签订停止一切核试验协定之由，不予提供原已与中国签约的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这种变相遏制打压中国研制核试验的政治行径，引起中共中央高度警惕。1959年7月上旬，庐山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高层开会决定自己搞原子弹。《周恩来年谱》记载“向宋任穷等传达中央关于研制核武器方面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¹⁷⁾

针对苏共中央6月20日信件，中共中央决定自己搞原子弹，这在庐山会议上是件大事。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笏（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1959年庐山会议。在笔者多年采

访中，他曾提到庐山会议上传达过苏联中断提供核武器样品那封信，大家很气愤，对中央决定勒紧裤腰带自己搞原子弹，非常拥护。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问题的认识变化，可以说，也是与苏共中央这封信及赫鲁晓夫的相关言论，赫鲁晓夫与彭德怀的某些接触颇有联系。⁽¹⁸⁾

(二)

彭德怀，中共第六、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9年7月上庐山后，为“大跃进”等问题夜不能寐，亲自动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谈到了他对“大跃进”等问题的认识。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59年6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听取彭德怀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兰等八个国家情况的汇报。⁽¹⁹⁾当年报刊对外宣传也是“以彭德怀元帅为首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应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7个国家国防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军事公安部的邀请，前往上述各国进行友好访问”⁽²⁰⁾。1959年4月24日，以彭德怀为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开始东欧之行。团员有王树声、萧华、张宗逊、杨得志、陈伯钧、张学思、陈熙、路扬、朱开印、郑文翰、冯征。第一站波兰，第二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随后军事代表团访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5月28日，中国军事代表团到达阿尔巴尼亚。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亦于5月25日先期到达，6月5日离开。中苏两国代表团在地拉那不期而遇。5月29日下午，彭德怀出席苏联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为赫鲁晓夫举行的招待会。5月30日下午参加地拉那中心广场欢迎赫鲁晓夫大会，彭德怀被邀请坐在主席台赫鲁晓夫的旁边。晚上，彭德怀出席了阿方招待赫鲁晓夫的宴会。在阿尔巴尼亚，彭德怀客观上多次与赫鲁晓夫相遇接触。6月6日，赫鲁晓夫访问阿尔巴尼亚归国后，在莫斯科群众欢迎大会上讲话，特别提到“苏联党政代表团在阿尔巴尼亚访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也飞抵那里进行友好访问，因此我们也同他进行了愉快的会面和交谈。”⁽²¹⁾赫鲁晓夫

这段讲话特别强调“愉快”二字。另，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行程，当年所有报纸仅写前往东欧7国和归程经蒙古访问，均未提到苏联，故至今多种版本“共和国大事记”均未记载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经过苏联履经九国一事。但据驻苏大使刘晓回忆，彭德怀返程途中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等有公务接触。原文如下：

[1959年]彭德怀路过莫斯科时，在机场上向迎接他的苏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表示，要与赫鲁晓夫会见。彭总要见赫鲁晓夫，主要是为了把建设中国军事工业的一些重要项目落实下来，这件事只有赫鲁晓夫才能做决定。因此，当彭访七国回莫的第二天，赫鲁晓夫接见了彭。彭德怀和赫鲁晓夫会见前，我先到赫鲁晓夫的秘书办公室等候。苏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传达，赫鲁晓夫的这次谈话主要是交换中苏两国军事上共同有关的问题，参加会议的苏方人员有安东诺夫大将。赫鲁晓夫除强调苏联核武器、新式武器的威力以及苏联海、陆、空军现代化装备与力量强大外，特别提到为防备美在远东侵略，尤其是对中国的军事侵略。苏联在远东地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和空军力量，一旦有事可以对中国进行强大的援助。赫说美国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因此赫向彭提出，中苏两国进行具体军事合作有迫切的必要，特别是要迅速安排中苏海军与空军的合作。这方面是美国的强处，是中国目前的弱处，如海军与空军方面能实现合作，这一形势就会改变。赫鲁晓夫又表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可以以苏联为中心和华沙条约国军事条约衔接起来，这也就是华沙军事条约的延伸。彭德怀表示可以向中央请示，研究赫鲁晓夫的想法，这从战略方面来看对中国是会有帮助的。至于合作的具体方案和形式，他回国研究后，再与苏方共同研究。彭接着向赫提出要求加强对中国军事装备与新式军事技术的援助。在说到这个问题时，彭向赫说明了我国国防计划方面要加强的地方，我国当时军队的编制与军事装备和急需的装备革新及补充等情况。赫鲁晓夫听后，对彭的要求均表示原则同意，提出在军事装备与技术援助时要多派专家来帮助我国，并希望中国武器生产与苏联统一化，彭表示请示中央考虑。此外，也谈到了一些有关南斯拉夫、裁军、四国首脑会议以及当时苏联内部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争论问题。⁽²²⁾

刘晓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参加过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党的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55年至1962年任驻苏大使。1959年8月参加了八届八中全会，这段他亲历的1959年6月初彭德怀与赫鲁晓夫的接触，应该是当年他作为驻苏大使和中央委员，庐山会议前和八届十中庐山会议时必须向中央汇报的高度秘密性重要内容。刘晓回忆：

在彭德怀访问七个东欧国家将回莫斯科前，我在外交场合活动中遇见了米高扬，米向我说，苏联方面高度评价彭这次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访问，其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他说彭会了解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经验教训，他们如何运用苏联的经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苏联为中心加强团结互助合作，交流经验，统一步调是非常重要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最可靠的保证，也可以加快速度向共产主义迈进。关于这些，中国也会如此理解。他希望，彭将这次访问的结果向中国介绍，将会使中国对各社会主义国家迫切需要互助合作、统一步调的愿望能进一步了解。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希望中国在这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与发展的一个强大的因素。他希望我将他的这些意见转告彭德怀。当彭总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我就把米高扬的话全部转告了彭总。

米高扬要求转达给彭的这一段话重点就是一句：社会主义各国要统一步调，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中国对统一步调进一步了解。这就是当时苏联、东欧、亚洲各国执政的共产党都知道的赫鲁晓夫的一句“名言”，叫“对对表”。^[23]

刘晓1962年从担任驻苏大使回国后，续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67年至1968年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其后被迫害身陷囹圄七年。他对彭德怀1959年访苏的回忆，是在改革开放彭德怀彻底平反后公开发表的，可以排除任何文过饰非的主观动机。

彭德怀生前关于1959年6月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的这段接触，在《彭德怀自述》“庐山会议前后”一章中，仅写了一句话“我在一九五九年五月访问了东欧各国，六月中旬回到北京。”^[24]对照《彭德怀自述》编辑组1981年为该书写的“出版说明”特别强调的，“在整理时，我们以一九七〇年的自传式材料为基础，以

其他几份材料做补充，相互参照，统一划分了章节，对文字衔接和标点做了一些技术性的整理；对部分内容作了删节。此外，均保持原貌”。^[25]

客观地说，彭德怀1959年5月在阿尔巴尼亚和赫鲁晓夫的公务接触，1959年6月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的交谈，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庐山会议上了解诸种情况后的印象应该是深刻的。一是1958年苏联国防部是通过彭德怀转达，坚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1958年7月21日、22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连续与尤金会谈，彭德怀均在座，毛泽东鲜明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26]7月31日，赫鲁晓夫特为此事来中国，四次会谈彭德怀亦在座。赫鲁晓夫表示永远不会提（军事“合作社”这样的问题。^[27]但对照赫鲁晓夫1959年6月彭德怀停留莫斯科期间，对彭德怀强调“苏联在远东地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和空军力量，一旦有事可以对中国进行强大的援助。赫说美国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因此赫向彭提出，中苏两国进行具体军事合作有迫切的必要，特别是要迅速安排中苏海军与空军的合作。”^[28]赫鲁晓夫显然完全食言了；同时打破了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立国底线。二是彭德怀回国当月，苏联恰恰违约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三是赫鲁晓夫在国际上大肆宣传与彭德怀“愉快的会面和交谈”。这一切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特别是在不断收到苏联释放的非议“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声时，都会加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及苏联国防部“对对表”的警惕。

1959年7月19日，毛泽东在庐山上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7月2日报送的《苏对我大跃进的反映》报告，毛泽东将题目改为《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并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研究。”报告说：最近在苏联部分干部中，特别是在与我国有工作关系的某些干部中，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有关我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这些议论的基本特点是抛开问题的主要方面，对中国的成绩避而不谈，专讲毛病，结论是中国党犯了错误。但也有不少干部听了这些话后，表示怀疑或有不同的看法。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建议领导上考虑是否有必要由中央或外交部

向兄弟国家党或驻华使馆作统一的说明和解释。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²⁹⁾

在毛泽东批示转发苏联材料的同时，赫鲁晓夫正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在波兰进行为期 10 天的访问。7 月 18 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省“普拉采夫”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讲话，讲话内容提到公社所有制脱离实际。赫鲁晓夫这样表述“当然，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遇到过不少困难。国内战争刚结束后不久，我们就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当时曾经这样议论‘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吧。’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立共产主义。公社是组织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指的是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但又想对公社事业少出劳动。正是所谓‘能干多少就干多少，需要多少就拿多少。’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结果。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到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干活，但是按付出的劳动取得报酬。”⁽³⁰⁾

赫鲁晓夫 7 月 18 日在波兰的这个讲话，波兰报纸发表时删去了上述这段有关公社的文字，《真理报》则予以全文公开发表。

赫鲁晓夫对中国人民公社的批评或指责并非第一次。据波兰相关档案记录，1958 年 11 月 30 日，赫鲁晓夫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曾说道“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 30 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³¹⁾不久以后，苏联领导人再次发表对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

中苏两党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的分歧是严重的。有分歧不可怕也正常，但查询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内兄弟党际关系的重要一点是屋里吵架，当面提出来，而不是公诸于众，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支持。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没有公开谈，报上没讲。我们很谨慎，也未公开批评你们，采取了内部交谈的办法。”⁽³²⁾用刘少奇的话说，“我们只是当面给你提意见，我们背后不向任何人讲我们

之间的分歧”⁽³³⁾，特别怕被敌人所利用。这是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当时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党际关系的底线之一。这一点也是赫鲁晓夫 1958 年 7 月底来华认可的一点。但赫鲁晓夫又很快自己打破了。

自然，这种打破很快被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署扑捉并深入研究。

苏联不赞同中国人民公社，美国人分析有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恐惧中国党更加强烈地要求试验核武器，二是恐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第二个意识形态中心出现，三是寄希望于中国党内部亲苏力量的出现。⁽³⁴⁾

(三)

毛泽东 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对赫鲁晓夫时论的高度警惕由此及彼是非常深远的。

1959 年 7 月 29 日，毛泽东在庐山上决定对赫鲁晓夫言论在中共党内进行回击。他在胡乔木 7 月 28 日报送的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 2831 期《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批示：“将赫鲁晓夫的一篇（连同中央社的一则纽约消息）放在前面。三篇印在一起，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做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³⁵⁾8 月 1 日，又批示王稼祥“此件请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三篇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³⁶⁾

显然，由于赫鲁晓夫时论及中断提供核武器样品在庐山会议上发酵，加之彭德怀 1959 年多

次与赫鲁晓夫公务接触，彭德怀7月14日那封信，当时在毛泽东和大多数中央委员印象中，再也不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单纯向党的主席提意见，而是客观上存在与赫鲁晓夫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言论不谋而合，甚至“里应外合”之重大嫌疑。

在庐山会议上为此特别成立了专案组，查证彭德怀有无“里通外国”的事实。据当年彭德怀访问东欧诸国翻译章金树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批判彭德怀后，金树同志接到紧急命

令，要他立即赶赴庐山。当日他到达机场时发现，同行还有萧华同志。他们两人乘专机由北京飞往庐山。上山后金树同志被带到一幢小楼里隔离了四天，专案组要他揭发彭发生在东欧几国访问过程中‘里通苏修’的问题。”⁽³⁷⁾1959年庐山会议上，将彭德怀7月14日信件与率团访问东欧及与赫鲁晓夫交谈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中断提供核武器样品的时间碰撞在一起，是导致毛泽东对彭德怀信件的误判与处理的一个原因。

(参考文献)

- (1) [8] [34] 沈志华，杨奎松.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5册（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350, 352, 379—403.
- (2) 1951年9月8日《美日安全条约》签订；1951年8月30日《美国、菲律宾联防条约》签订；1951年9月1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签订。1953年10月1日《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签订。1954年5月19日，《美国、巴基斯坦共同防御条约》签订。1954年9月6—8日，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新西兰、泰国、巴基斯坦等八国《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签订；1954年12月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签订。
- (3) [6] [15] 卫林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40, 249, 218.
- (4) [5] [21] [30] 赫鲁晓夫言论：第12集（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 90, 91—92, 206, 370.
- (7) 宋任穷回忆录（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350.
- (9) 沈志华，李丹慧. 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27.
- (10) [11] [12] [1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238—239, 239, 239, 240.
- (13) [14] [19] [29] [35] [36] 毛泽东年谱：第4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89, 86—87, 71, 107, 124—125, 125.
- (16) [26] [32] 毛泽东外交文选（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322, 332, 325.
- (18) 2007年7月7日在北京玉渊南路陶鲁笪家中采访陶鲁笪所谈。
- (20) 戴舟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 130.
- (22) [23] [28] 刘晓. 出使苏联八年（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108—110, 110—111, 109.
- (24) [25] 彭德怀自述（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66, 2.
- (27) 毛泽东年谱：第3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96.
- (31) 沈志华，杨存堂主编.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87—190.
- (33) 阎明复，朱瑞真. 忆1958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四次会谈（A）. 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第5册（M）. 济南：济南出版社，2012. 213.
- (37) 章金树. 随彭德怀访问东欧和蒙古（J）. 百年潮，2008, (9).

(责任编辑：曾 敏)